

2026年4月21日

■ 观点

增强博物馆学术国际传播 助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

杨瑾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文物局等九部门《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实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创意计划，重点培育10—15家代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引领行业发展的世界一流博物馆”以来，一些致力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的博物馆通过出入境展览、教育项目、人才交流、科研项目等多种措施获得更多的世界“可见性”，不断赋能既有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与此同时，学者也以国际学术观点发表的形式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成就，合力构筑中国博物馆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共同体。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愿景下，应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从整体上不断提升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加强顶层设计

当前，我国博物馆在迈向世界博物馆强国之路上，实施中华文明、世界文明展示工程，增进国际合作，已经成为国家外交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以文物展览交流为主体、以教育与科研为特色、以数字传播为新特征，为全球博物馆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而且通过综合性和专题性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积极参与博物馆的国际治理和全球协同发展。中国博物馆协会区域博物馆专委会2024年举办的“博物馆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培训班”就是从综合学术发展角度助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的一次积极尝试。时任理事长刘曙光为培训班授课时将博物馆人形象地称为“文化外交家”，概括了博物馆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文化自觉性、体系性和学术性。“博物馆外交”“博物馆文化外交”等研究议题也成为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资助项目，相关学术成果的国际发表也日益增多，但输出端呈现非组织性、零散化现象，有组织的国际学术传播力度不够。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两点着力：

一是增强国际学术传播在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体系中的权重。特别是在央地共建的重点博物馆运行评估指标体系中应该强调多语种国际学术传播的数量和质量或单列指标，在一些行业性重要奖项中，如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展览推介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最具创新力博物馆及其他全国性奖项评比中设立考评指标，以便树立一批国际学术传播标杆或示范性博物馆或项目。二是以组织地提升中国博物馆学术研究成果的“国际能见度”。中国博物馆协会向全球发行的China Museum Toda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希望相关部门推出更多的以国际学术传播为导向的专题性项目或计划，或有组织地为学者提供专业的国际学术发表咨询服务，如英文写作和编辑，向国际读者提供系统的治理实践思想和价值意义。再如联合国家社会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推出中国博物馆年度学术外译项目。

增强问题意识

检索各类学术资源库，关于博物馆国际学术传播的理论研究明显不足，有些甚至是把博物馆相关实践作为单一的概念接受者或者某一理论的验证者。笔者认为，博物馆国际学术传播需要更加广阔的国际视角，需要凝练学术问题的学术高度。然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历年来自博物馆运行评估报告均显示，各博物馆科研成果数量较少、质量不高的短板虽有弥补，但数量增加速度较慢和质量提升维度较小仍是制约瓶颈。一些国际发表甚至存在削足适履，或为某些“主流”理论的简单套用，对既有实践和特色理论总结提炼不够，提出建设性挑战的能力和话语权不强。这种现象屡见不鲜的关键在于，层级管理结构下博物馆发展形态不一而面临的问题“层级”不同，换句话说，一些“发展中”博物馆的“问题”对于“发达”博物馆而言根本不是“问题”，因此，针对“问题”的理解与破解自然各有维度。

就国际传播角度而言，正确理解国际关注的“问题”，从中国博物馆发展角度出发，以中国诠释方法予以破解与书写。就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而言，应着眼于站在“发达”之上，能够提出针对此类博物馆的关键议题，多学科地析出针对性“问题”，进行专题性研究，比如西方理论的中国化构建，提炼案例化中国博物馆实践。国家文物局2022—2023年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就是很好的学术研究素材，通过学术发表向国际介绍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作为个案研究最佳对象的故宫博物院“零废弃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百物看中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中国丝绸博物馆“丝绸之路数字文物共享平台”、敦煌研究院“敦煌开放素材库”等就是中国博物馆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典型场景。

促进学术共同体建设

尽管当前已有各类各级博物馆联盟，但针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尚无学术性联合组织，不能集中优势资源研讨关键性议题和掣肘性问题，或者从学术层面进行发问或阐明国际学术传播的理据。针对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问题”的层级化现状，学术研究与国际传播需要一个基于社会多方参与的共建型学术共同体，致力于兼具本土创新性和国际可见性的博物馆与博物馆学研究。参照胡安宇在9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国际发表要从学术、学问、学理上下功夫”，博物馆国际传播也要注重通过国际学术发表而将经验和逻辑有机结合，提升理论对话、思考和创新等方面的质量，构建并提升学术、学科和话语自主知识体系及其国际影响力。具体做法有三：

一是聚合多学科优势资源，将中国博物馆当前发展中“问题”的经验模式与深度理论诠释相结合，扩大国际读者学科领域，激发对话、交流与讨论，将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经验现实和既有理论置于国际学术前沿框架中，进行更进一步的质证。二是面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定位，参照其他领域“世界一流”建设成就，并与之形成共同的中国学术国际传播体系，避免惯见的特定行业的理论偏好，或以偏概全的经验呈现。有些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博物馆都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寻求更大、更遥远的国际学术传播定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稳人民立场，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智慧和中方方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体系，建立与中国博物馆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三是着眼数字时代的博物馆国际传播技术，采用数字学术思维和方法，利用各类数字学术发表平台系统呈现和传播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探索中国案例、中国智慧为国际学界提供理论洞见的可能性，在世界性学术资源系统中彰显中国经验的“中国”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与变革意义，加强中国案例对更广阔的社会科学读者的理论意义，引发新的学术性关注和反思和知识积累。例如，国家文物局每年“5·18”公布陈列展览数量、教育活动和观众人数，颁发各类奖项，如何有组织地从学理层面优中选优，将基于经验总结的理论提炼进行国际学术发表，以此纳入世界博物馆相应的理论库中，至少进入ICOM各个专委会学术资源库中，如此才可以与世界各国学者进行学理对话，避免丰富实践数字化和节庆化，避免理论滞后而带来的国际曲解或误解。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并非一个口号、一个愿景，而是世界一流博物馆在当代中国实践的再建构，在当代世界变化中的新面向，在博物馆学与其他学科等多重张力影响下甚至具有巨大的理论与实践潜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博物馆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是推进中国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强中国特色博物馆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及其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博物馆学术传播面临着诸种挑战，如“重”展览、“轻”学术的国际交流传统，理论提炼和理论创新不足、有组织的输出不足、高级别国际合作和国际学术对话的制度化不强、语言和网络接触或转换的障碍较大、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和被引用率低等。如何克服这些不足，值得进一步探究。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本版责编：崔波 王龙霄 甘婷婷

古物新命：第一批国保单位的博物馆化

刘秀娟

1961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单位”)，共180处。其意义不单是制度层面的革新，还是文物价值重构的开始：改建为博物馆或陈列室，向公众开放，成为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至1966年，已有38处国保单位通过恢复原状、布置新陈列及直接借用其建筑空间作为馆址等方式，完成了博物馆化。

从封闭向全民共享的空间重构

博物馆化首先是对国保单位空间性质的根本转换。它打破了原有空间秩序，消解了附着于其上的宗教、权力或宗族价值，成为展示社会主义新文化，向“人民”开放的公共空间。空间属性的变化，还重塑了人与物的关系。

空间边界的消解。这不仅表现在物理空间向观众开放，还有心理层面的“祛障”。观众不再需要特定的身份、背景或资格，只需以“人民”的身份，便可获得观看的权利。空间属性的根本变化，预示着人与物关系的调整：古物在旧时代是“封建官僚、地主等的玩赏之物”，被垄断于特定阶层手中；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物被重新定位为“历代人民的伟大创造”，在归属权上属于历代劳动人民。

空间边界的消解，又为后续的意义重塑奠定了基础。当古物从封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它们的意义也就必然会从特定群体的垄断阐释，转为面向大众的价值重构。

参观仪式重建。不同于宗教空间的设计服务于“朝拜”，身体动作本身就是信仰实践的表述；博物馆路线设计的目的是“观看”，身体成为认知活动的载体。以展陈序列引导观众参观的先后，策展者的叙事逻辑引导观众的认知顺序；说明文字构建了观众的认知方向。将叙事主题置于特定的话语体系之中，观众接纳着空间赋予的观看秩序与认知逻辑。

博物馆化使国保单位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构及教育的载体。通过空间重构不仅改变了古物所处的空间，还改变了人与物的关系，进而改变古物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从历史遗存到文化资源的意义重塑

博物馆化不仅改变了“物”的存在语境，还赋予了其新的文化价值，使其成为承载特定意义的博物馆藏品。由此，国保单位在事实上转化为意义的生产场域，通过特定的叙事方式及阐释体系，对“物”的价值进行重新解读与建构。

从“原生语境”到“展览语境”的转换。博物馆化将“物”从原生语境中剥离，这也意味着其承载的原有意义的消解，被观看、被凝视的对象。然而，

“物”在失去原生语境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展览语境。这一新语境的意义的生产机制，与原生语境截然不同：意义不再来自宗教或封建统治权威的赋予，而是通过国家对文化遗产地位的认定、展览叙事方式和空间布局等策略构建。语境的转换，必然带来叙事与表现方式的变化。在展览语境中，“物”被重构为可验证的知识与信息，完成从信仰到知识的范式转换。该过程中，“物”不再仅仅服务于讲述具体的故事，而是被纳入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成为建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文献与证据。“物”的记忆与文化价值在这一叙事重构中被逐渐确立。

从遗存到资源的价值重估。传统视域下，古物的价值取决于时代之久远、数量之多少，以及其自身的科学、历史与技术价值。而第一批国保单位的选定，确立了新的依据文物自身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的遴选标准，并重新划分了文物类别。该过程中实现了从遗存到文化遗产的古物身份转换。博物馆化，则使其进一步转化为可被研究、教育、利用的文化资源。前者完成了身份的重塑，后者实现了功能的变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构的重要资源。

价值重构的内逻辑

空间重构与意义重塑的背后，实质上是对国保单位的价值重构。该过程既明确了博物馆化的根本目的，也指明了价值转换的方向。

国家作为价值阐释的主体。第一批国保单位的公布与博物馆化，是由国家主导的系统性文化变革，国家作为文化建构与价值阐释的主体。作为主体，国家不仅制定价值标准，符合优秀传统文化建构需求的古物被纳入保护与阐释序列，成为国家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指明对其价值阐释的方向，展览内容及文本说明等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目标；主导资源调配，将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博物馆建设之中。可见，第一批国保单位的博物馆化是国家主动推动的文化建构实践，初始便承载着建构国家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的使命。

“人民”是价值指向的对象。这一价值指向的确立，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确立了博物馆“为人民服务”的功能维度。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在于“使人民大众正确地认识历史、热爱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这一表述将“人民”置于博物馆服务的主体，标志着博物馆从旧时代的雅集之所向新时代的教育机构的功能转型。二是赋予古物“人民性”的本体维度。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指出“党和政府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很多的工作”来保护古代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因为它们“它们是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是历代人民所创

造的，它们具有不朽的人民性”。这一表述揭示出文物权属的转换，体现出对古代劳动人民创造成就的特别彰显。

从群体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价值转换。古物原本承载的是特定群体的文化认同，但这些认同分散于不同群体，彼此隔离。博物馆化的过程则将这些分散的、小群体的文化认同，整合为统一的、全民的认同。这一价值重构的核心是以“民族—国家”的认同框架取代原有的宗教、宗族及阶层认同，使古物从特定群体的文化象征，转变为全体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统一建构。

祛魅与赋魅的双重重构方式。第一批国保单位的价值重构，通过祛魅与赋魅的双重运动辩证进行。所谓祛魅，是将古物从宗教的神化、封建的迷信或特权的附庸等传统意义秩序中解放出来，打破对古物的非理性崇拜，用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重新审视其价值，成为理性认知的对象，为意义的重新阐释奠定基础。如郑振铎在规划故宫博物院改进方案时明确提出，故宫所藏文物是“我国历代的美术品和工艺美术品”，其陈列重点应是“中国的美术品和工艺美术品”。这一表述将故宫从“帝王遗产”重新定位为“美术品和工艺美术品”，标志着观看视角的根本转换。此外，还有科学知识的介入。用展览内容、文本说明及学术研究替代传统的口传心授、秘不示人。

祛魅则是将古物纳入新的意义秩序之中，赋予其新的神圣性。将古物界定为民族瑰宝、精神象征，成为彰显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灿烂成就的物质表征，提升民族凝聚力、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保单位本身就是通过国家权威的认定，将“物”提升至具有国家级意义的重要位置。通过赋魅使古物成为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成为传递特定价值观念的媒介。

祛魅与赋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古物价值重构的核心：先祛除旧的、落后的神圣性，打破非理性的原有价值认知；再赋予新的符合社会主义文化需求的价值体系。旧的神圣性服务于旧时代的社會秩序，而新的建构则服务于新时代的国家认同。

第一批国保单位的博物馆化实现了对其价值的重构与阐释。它作为国家主导的文化行为，以“人民”为指向，通过祛魅与赋魅的双重实践，对古物进行了空间重构与意义重塑，使其从旧时代的历史遗存转化为新时代的文化资源，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重要资源。事实上，这一重构始终处于动态进程中，新时代提出的“让文物活起来”正是“古物新命”在当代的延续与深化。这也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本质上是持续不断的价值重构的过程。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全景呈现汉藏交融史诗

“高原丝路 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华美亮相

本报记者 崔波



范。寺内现存壁画1523平方米，其中近80%为明代早期作品，既有严格遵循藏传佛教造像规范的题材，也有以中原青绿山水、人物线描技法绘制的佛传故事，汉藏艺术风格共生交融，填补了敦煌壁画之后明清壁画艺术的发展空白。瞿昙寺严格遵循明代宫廷中轴线对称格局，与故宫规制异曲同工，其中故宫奉天殿已失传的抄手斜檐形制，在瞿昙寺保存完好，为建筑孤例。

展览多维亮点打造文化盛宴

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青海省博物馆专家组成的专业策展团队精心打磨，使展览通过精品文物、壁画临摹、数字科技、活态演绎、学术交流、非遗展示、文创开发等维度，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文化体验。

数字化保护成果集中亮相。展览转化壁画数字化采集成果，通过高精度临摹壁画工艺，抢救传承濒临失传的传统绘制技艺，借助数字影像载体全方位展现丝绸之路青海道千年文脉。

展览期间，将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举办



系列学术讲座，同步编纂出版展览图录，多维度挖掘阐释展览的历史与学术价值。

展览期间还拟推出活态演绎与沉浸式体验。原创情景舞剧《大明瞿昙》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历史；现场绘画演示让观众深度理解壁画创作技艺；《瞿昙秘境》沉浸式VR体验，通过空间叙事、真人交互、多人互动等形式，实现观众从“看壁画”到“入壁画”的跨越。

展览也将瞿昙寺花儿会、南山射箭两项国家级非遗纳入叙事体系；通过影像与实物展示汉、藏、回、土等少数民族群众文化共生的鲜活场景；化隆唐卡、土族盘绣、银铜器制作与鎏金技艺等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展现青海多民族非遗传承的丰硕成果。展览特设文创展示区，涵盖323款文创产品及167种青海特色物产。围绕瞿昙寺核心IP开发的系列文创，将壁画艺术之美融入日常生活；青海酸奶、沙棘原浆等高原特色物产，让观众实现“视觉+味觉+体验”的感知，把高原文化“带回家”。

据了解，展览还将同步上线线上数字虚拟展厅，打造永不落幕的“云端展览”，让更多观众感受高原丝路的文明魅力与汉藏交融的深厚底蕴。

同时兼顾了各类观众的参观习惯。

提升观感：数智化运用。展览多处运用文物动画，使文物活起来，带给观众较强沉浸感。比如序厅的乐舞俑，文物上方播放以乐舞俑为原型的动画，“他们”从洛阳、成都飞驰而来，游玩新昌的名胜古迹后来到新昌博物馆唐诗之路展厅，实现以展推城，体现文旅融合。巧妙借助数字展柜解读文物、借用春晚同款机器人做讲解、设计诗情画意的动态主题墙、设置加强互动感的触屏答题和VR线上展等现代科技，打造生动有趣的数智展厅，使内容信息的传导和阐释直观多元、主题突出，富有节奏感、趣味性和参与性，让观众多感官、沉浸式感受唐诗之路。这不仅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大唐诗宴，更是一场集视觉、听觉、味觉、触觉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盛宴。

(作者单位：新昌县博物馆)

(上接6版)

展陈设计

风格定位：诗意的浪漫。展览的艺术风格定位为“诗意的浪漫”，主色调选用清新典雅的“蓝青色”，暗合唐诗之路山清水秀的自然之美和大唐诗人潇散出尘的气质。首次设计动态主题墙，层叠叠嶂间一湾波光潋滟的河流，山间缭绕的云岚，渐行渐远的舟楫，晴雨变幻，燕雀掠空，这是大唐诗人扬帆而来的水路风光。序厅列队的七尊乐舞俑，结合数字动画，体现“我有嘉宴，鼓瑟吹笙”诗意，载歌载舞地将观众引入诗意、唯美的展厅。头顶的蓝青色流苏与淡淡印有30多首描写新昌唐诗的米咖色地贴相映成趣，组成一条浪漫的水上诗路，形成“诗中有